

留守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历时性影响研究 ——以湘赣两省为例

■ 刘 凌 吴 蕾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通过对有留守经历的“80后”青年进行访谈,发现该群体童年的亲子分离感知基本延续至其青年和成年早期,童年的亲子分离感知强化了其与父母的低频沟通模式,塑造了低亲密度的亲子关系;在成年期,受访者与父母的日常互动增多,亲子距离感被弱化,但亲子关系并未大幅改观。因此,要以构建积极的亲子分离感知为重点,兼顾亲子沟通的深度和频率,以增进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

【关键词】留守经历 亲子分离感知 生命历程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1.008

一、问题提出

据数据统计,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较“十三五”初期下降28.6%^[1]。留守儿童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部分留守者已成年。当前,学界较多关注留守儿童当下的身心健康、生活状况及其影响机制,较少关注留守经历对成年人亲子关系的长期作用。与此同时,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容易被忽视,因而难以评估与该群体相关政策的长期效果。

亲子关系是一种具有明显情感取向的人际关系,它集中体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静态情感和动态沟通,即亲子情感联结和亲子沟通过程。其中,亲子依恋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最重要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的构建取决于生命早期的亲子互动体验与感知。亲子沟通是指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方式和内容,是亲子之间传递和反馈情感的动态过程,也是亲子关系联结的重要途径。因此,考察特定群体亲子关系的形成与变化需充分关注童年时期的亲子互动感知和亲子联结(即亲子沟通和亲子情感),及其对亲子关系后续发展的意义。

儿童时期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基础阶段,也是安全型亲子依恋形成的关键时期。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生命早期阶段的亲子分离体验会对亲子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相应地,依恋理论认为,童年的亲子分离会阻碍安全型亲子依恋的形成,并影响其成年期的亲子依恋状态。但是,依恋理论并未阐明童年的亲子依恋表征影响成年期亲子依恋的动态过程,因此,难以解释童

收稿日期:2022-11-11

作者简介:刘 凌,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流动人口、绿色发展;

吴 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社会福利博士,主要研究社会工作教育与个案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生命历程视域下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机制研究”(课题编号:FRF-TP-20-023A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的留守经历如何持续影响亲子关系。生命历程理论对特定生命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思路,即通过回溯童年时期的留守事件和亲子分离感知、亲子联结状况,及其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变化,剖析留守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历时性作用。为此,本研究从曾留守者角度,回溯其留守经历和生命早期的亲子关系,以及在后续生命轨迹转变过程中的亲子关系状况,构建留守群体亲子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进而探究留守经历对该群体亲子关系的历时性影响机制。

二、文献梳理

农村“80后”是我国首批大规模留守儿童的主体,其中很多人自小与父母分离,由亲戚代为监护^[2]。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在生命早期经历亲子分离,会对其当下身心发展^[3]、学业表现^[4]、社会适应^[5]等带来负面影响,且上述影响对个体生命发展具有历时性意义。根据依恋理论,童年的亲子分离会阻碍生命早期安全型亲子依恋的形成,并影响其在青少年、成年阶段的亲子依恋^[6]。但是,依恋理论并未明确解释生命早期的依恋表征与后续的亲子依恋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生命历程理论对特殊生命事件及其持续性影响的阐释,为深入理解童年留守经历如何影响农村“80后”后续生命中亲子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参考。

(一)生命历程视域下亲子关系的演化机制

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范式关注个体生活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强调受社会变迁影响的生命事件(包括事件发生的时点、先后顺序)及其对个体生命后期发展的作用^[7-8]。埃尔德(Elder)将生命历程(Life Course)界定为,在人的一生中,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并通过年龄分化呈现出的事件和角色模式^[9]。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横跨一生,生命轨迹的转变或延续是个体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10]。概言之,生命历程理论研究范式注重将个体层面的行为和生命过程置于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系统中考察,其实质是个人、社会、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因此,该理论有助于从微观和宏观视角阐释生命事件对个体身心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长远作用机制。

当前,生命历程理论已被广泛用于探讨个体早期生命过程及其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就亲子关系研究而言:第一,因子女生命历程处于不同阶段,亲子关系会经历冲突、稳定、亲密度减弱等演化过程。比如,在子女的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由于子女生命轨迹的变化(比如,离开原生家庭、经济独立或婚育等)导致亲子联系减少、空间距离增加、互动模式改变,使得亲子亲密度呈现下降趋势^[11],其中,当子女向成年早期(17-22岁)过渡时,由于亲子接触和冲突减少,亲子亲密度会保持相对稳定^[12];当子女生育孙辈后,相对于未生育者而言,成年子女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质量较低^[13-14]。第二,亲子关系反过来也会推进或阻碍子女的生命历程演进和社会化。在从青少年向成年发展的过程中,亲密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子女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进入成年后,女性与父母的情感联系越强,就越有可能在延迟组建新生家庭或面临新生家庭破裂时,选择再返回原生家庭^[15]。此外,青少年时期健康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减少子女的犯罪行为^[16],使子女在高中阶段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17],并使其健康和幸福感受到提升^[18]。第三,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亲子分离研究发现,因移民^[19]、父母外出务工^[20]或生活变故(比如离婚、去世、入狱)^[21]等产生的长期的亲子分离,对子女身心健康(比如身高和体重增长、对疾病的易感性、精神病理症状)^[22-24]等均有负面影响,但是,子女对亲子分离的积极感知有助于子女适应接连不断的逆境^[25]。

综上所述,在生命历程的不同时期,亲子关系伴随子女离家求学、工作、婚育等生命事件的发生而变化,且亲子关系对子女生命发展有长远深刻的影响。此类研究印证了生命历程理论

的基本观点,表明家庭成员的个体生命历程变化会引起家庭关系的变化^[26]。这对本文的启示包括:第一,子女生命历程的演进改变了亲子沟通的时空情境、频率、内容等,进而影响亲子关系;第二,不同程度的亲子情感联结,使得亲子关系对子女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第三,亲子分离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受子女对分离感知的影响。

(二)生命早期的亲子依恋及其发展

1969年,英国精神分析师鲍尔比(Bowlby)提出依恋理论,指出个体早期与看护者的互动会促使其对自我、世界以及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关联产生期待和认知,形成心理表征即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并转变为一种无意识、自动化的运作^[27-28]。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倾向于用已有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解新信息,早期经历就会影响个体的后期依恋类型,这是依恋理论的核心观点。此后,安斯沃思(Ainsworth)采用陌生人情境法分析幼儿与母亲分离和重聚的反应,将亲子依恋划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幼儿依恋关系的内在工作模式难以检测成人时期的依恋类型,梅因(Main)等研究者采用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方法,即根据被试者对自己依恋历史的描述评估其依恋模型,结果表明成人的依恋类型包括自主型、轻蔑型、纠缠型与未决型,并与幼儿四种依恋类型相对应^[29]。

关于个体早期依恋表征如何影响成人依恋模型的内在机制存在修正论和原型论两种观点^[30]。修正论认为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依恋类型可能会保持稳定,但早期的依恋表征可以被更新,内部工作模式并非不可改变。诸如,贫困状况、遭受伤害、亲人的缺失、父母离婚、消极生活事件或新依恋关系的建立等社会环境或个人发展因素会使个体依恋表征模型产生积极或消极变化^[31-32],所以依恋发展过程并不稳定。与之相对,原型论认为生命早期的依恋模型会通过重构个体对人际事件的认知确认和维护内部表征,从而在个体不同发展阶段保持高度一致,并对后期相关的生活体验产生直接作用。这种稳定性的存在,可能源于个体间稳定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是工作模式的运行引导个体直接关注与心理表征一致的信息并产生与心理表征一致的人际事件的解释和理解^[33-34]。

上述两种对立观点的形成与研究者对内部工作模式概念的理解、测量工具和方法的选择,以及是否考虑内部工作模式的个体差异性及其随着个体成长而变化的情况有关^[35]。修正论和原型论过于强调论证依恋表征的稳定性,忽视了依恋表征在不同生命阶段保持稳定或产生变化的过程,换言之,依恋理论并未阐明生命早期的依恋模式持续影响成年时期的依恋表征的动态过程。

亲子依恋是依恋关系的核心,纵观个体生命历程,童年时期是建立良好亲子依恋关系的关键阶段。根据依恋理论,生命最初的依恋对象是母亲,个体建立良好亲子依恋的关键时期是两岁半之前,如果在该时段母婴分离,则不能稳定地建立亲子关系^[36]。童年的成长经历(比如污名化^[37]、被虐待^[38]、被寄养^[39]),伴随年龄增长的发展性因素(比如年级^[40]、自我分化程度^[41]、社会关系环境变化^[42-43]),以及亲子沟通^[44-45]、家庭结构^[46]、父母的亲密关系^[47-48]、社会文化^[49]等特征性因素均影响亲子依恋。与之相对应,亲子依恋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子女行为^[50]、心理焦虑^[51]、人格发展^[52]、恋爱关系^[53]、社会适应^[54-55]等。可见,亲子依恋的演化以童年时期的成长为基础,并与个体生命过程紧密相连,需动态地考察童年经历、发展性因素、特征性因素对亲子依恋的形成和演化的影响及其持续性问题。

(三)留守群体的亲子关系

一方面,作为一种亲子分离的成长经历,留守被认为是儿童健康风险^[56]、行为和情绪问题^[57]、学业成绩低^[58]、亲子关系疏离或断裂^[59]、自残行为^[60]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起因。对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或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因留守产生的消极影响会随着留守者的

成长及其在不同生命阶段与父母的沟通情况发生诸如强化^[61]、削弱^[62]或转化^[63]等改变。

另一方面,留守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会随着个体的成长而变化。“全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数据库”显示,来自落后地区、父母外出时间超过一年且受低学历者监护的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更低,同时,父母都外出显著降低了初中女生的幸福感,并使其亲子关系恶化^[64]。但是,有研究指出由于受家庭功能^[65]、社会支持网络^[66]等外部因素,及留守者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身心成长^[67]、认知图式^[68]的调节作用,童年留守并不一定导致亲子关系断裂,留守经历产生的亲子疏离也不一定在成年期固化^[69]。

留守群体的亲子分离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童年的留守经历对早期亲子关系的形成有消极影响,并会在个体生命发展进程中发生改变,个体对亲子分离的认知、不同时期的亲子沟通和亲子情感是触发其变化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第一,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可将童年留守经历作为特殊生命事件,考察不同生命阶段对农村“80后”亲子关系的长期作用,童年留守经历、个体对亲子分离的感知、亲子沟通和情感联结是分析重点;第二,根据依恋理论对依恋表征的形成与演化的观点,本研究通过考察童年的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成年时期亲子关系的关联机制,阐明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动态演化机制,其中个体童年的成长经历、发展性因素及特征性因素是本文分析的着眼点;第三,两个理论均关注生命早期亲子分离对其亲子关系后续发展的历时性影响,均具有动态的纵向视角,其结合点在于考察生命早期的亲子分离事件对不同时期亲子关系产生作用的具体过程和动态机制。

鉴于此,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范式为指导,以依恋理论为基石,对籍贯在农村地区的“80后”青年展开以自传为基础的回溯性深入访谈,聚焦受访者以留守经历为起点的亲子分离感知及其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亲子联结模式,即亲子沟通情况和亲子情感状态,并围绕受访者成长的社会背景探究童年的留守经历对个体的亲子关系产生的长期作用(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亲子分离感知指受访者对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开生活的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既包括因经历亲子分离而产生的悲伤、孤独、思念、自我安慰、自我激励等外露或内藏于心的情绪,也包含因此而激发的哭泣、言语、文字表述等行为表现。亲子联结是受访者不同生命阶段与父母的沟通模式和情感亲密度,前者由沟通方式、频率、内容、效果等要素构成,后者主要表现为受访者感知的深层情感的亲密。亲子分离感知和亲子联结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亲子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影响受访者亲子关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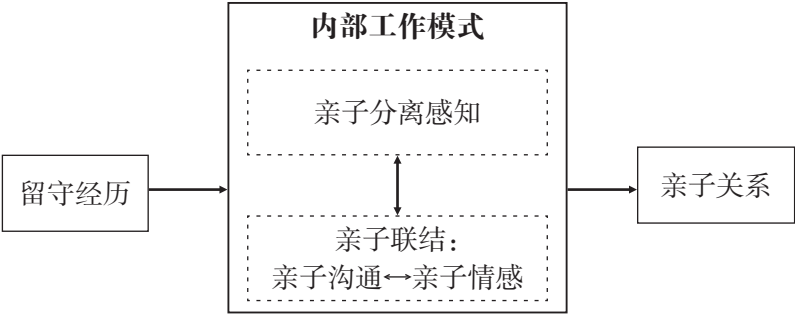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生命历程研究包括两种范式,即偏向定量方法的“北美范式”和强调定性方法的“欧陆范

式”^[70]。综合考量研究目标及可操作性,本研究主要采用以自传和深入访谈为主的回溯性定性研究方法,在此重点介绍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过程。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中的留守经历者均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出生于1980至1990年,且成长在农村,即15岁^①以前的生活轨迹主要在村镇或县域;二是有留守经历,即15岁以前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开生活的时间超过6个月;三是累计留守时间较长,即留守时间累计超过5年。

自2021至2023年,基于最大差异化原则,笔者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抽取籍贯为邵阳、浏阳、赣州等地的18名农村“80后”青年(出生于1984-1990年),其中,男性和女性各9人,高中及以下学历6人(含一名高中毕业入伍人员),硕士及以上学历5人,其余均为大专或本科学历。在受访者中,有2人为独生子女,其余均成长于多子女家庭;初婚15人,未婚1人,再婚1人,离异1人;16名已婚人员中有3人未生育(含一名在孕者),已育者中,育三孩1人,育二孩10人,育一孩2人。受访人员中,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共同生活的12人,未与父母一同生活的6人。

(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回溯性研究是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尽管该方法会因受访者选择性记忆或主观修饰过去的经历降低资料的可信度,但是,在缺乏历时性资料的情况下,由受访者本人确认并讲述重要的生活事件是比较可行的做法,也呈现了该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意义^[71]。为此,基于研究目标,本研究采用回溯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具体包含三个环节。一是问卷预调查,即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发放线上问卷收集潜在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并征询其参与意愿。二是个人自传,为提高研究效率,确保研究质量,以及更好地从受访者视角理解生命事件对其成长的意义,笔者先请研究对象围绕生命轨迹和亲子关系撰写个人成长自传,并以此作为深入访谈的基础。笔者共收回21份^②完整问卷,持续参与研究并提交个人自传者18人。基于最大信息饱和度原则,由于新样本已不能拓展研究资料的差异,本研究未再增加样本。三是深入访谈,即以受访者讲述个人童年生活经历(包括留守经历)和亲子关系为主题,重点关注个体对留守生命事件的感知及其对亲子关系的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8名研究对象现居住在湖南、广东及江浙等7省,笔者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访谈资料。访谈频次为1至4次,有效访谈时间为58至250分钟,均值为117分钟。所有一对一访谈均在受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所有录音均被转录成文字进行分析。资料分析过程中,秉持受访者视角,力求更高的共识性与合理性。

四、早期亲子分离与后续生命中的亲子关系

(一)童年时期:留守生活塑造亲子分离感知

除案例12、14、15^③的母亲未外出务工外,本研究中其他受访者的父母均是在其3-6岁左右(即学龄前)时进城务工,其父母是在城乡流动人口政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离开的农村。因父母外出务工带来亲子空间距离,一方面,使农村“80后”青年与父母的沟通远程化(经历了以书信为主向以电话为主的转变)、低频化(月度、季度,甚至年度计的沟通频率)、距离感(亲近感弱、较强畏惧感等情绪);另一方面,面临身心成长、学业发展、社会适应等困境时,亲子分离使

① 考虑到绝大部分农村“80后”在15岁左右开始从农村流动到县城求学,或流向城市务工,学校和工作单位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生活场所而非家庭,因此,笔者将15岁设定为农村“80后”的童年年龄上线。

② 其中含3名问卷填写者因时间冲突或个人意愿改变等主客观原因未继续参与研究。

③ 基于为研究对象保密的研究伦理,本文以数字1至18指代不同受访案例。

农村“80后”青年缺少父母的心理支持和陪伴,又或父母的支持变得滞后、乏力(强度不足)、低效(非持续)。上述远距离的亲子互动模式使受访者产生因没有得到父母陪伴的“分离—焦虑—盼聚—失望—调适”的心理过程。

受访者均因父母外出产生失落、孤单、思念等情绪,但是,其情绪强弱及行为表现并不相同。基于此,将受访者对童年亲子分离的感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外露型、压抑型、平和型与漠然型。其中,对亲子分离有强烈情绪感知的是外露型(4人)和压抑型(5人),他们在父母即将外出、返回,或将开启、结束寒暑假短暂的亲子共同生活时,会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与之不同,外露型会表现出对父母的依恋不舍,压抑型则较少表露情绪或以文字等间接形式流露对分离的伤感和对父母的思念。相对而言,平和型(5人)和漠然型(4人)受访者在情绪上的波动较小,且较少产生行为上的分离焦虑,但是,他们的情绪性质有明显差别,平和型受访者对亲子分离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漠然型受访者情绪冷淡,倾向于认为父母外出是缺乏亲职责任或忽视自己的表现。四种类型的亲子分离感知主要表现如下。

当父母准备回家过年时,我会跑到村口去等他们,有时会等一天。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后,得知父母第二天清晨要外出,我就起床追他们,哭得很伤心。(案例6,属于外露型)

父母在外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使我习惯了文字沟通,不善直接表露内心。我每次都是把对父母的思念写在信里,边写边哭,收到回信也是边看边哭。(案例16,属于压抑型)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我务工,母亲在家,所以,我能理解我父亲,对他也没有特别的想念或不舍。(案例12,属于平和型)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从我记事起父母很少在家,偶尔回家,他们也很少跟我交流,我不太关心他们的去留。(案例2,属于漠然型)

通过分析受访者童年亲子分离感知影响因素可知,除了人格特质、性别外,亲子分离的时点、累计时长、亲子团聚或沟通的频率与效果、母亲是否外出等与分离程度相关的因素,以及替代看护的稳定性和细致度、手足关系、朋辈关系、师生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学业表现等与留守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因素均对受访者亲子分离感知产生双重作用。两者对亲子分离感知的影响相对独立,一方面,分离程度高者对亲子分离有更强烈的情绪感知,对父母尤其是母亲有更多依恋、思念(比如,外露型、压抑型);另一方面,留守生活满意度较高者对亲子分离赋予更多接纳和理解(比如,平和型、漠然型)。与此同时,亲子分离程度高,并不必然降低留守生活满意度。例如,自3岁开始漠然型案例1由祖父母监护,直到其初中住校、高中肄业,其父母常年在外出,平日很少联系,但是祖父母给予其生活关爱和温暖,同时,朋辈关系、师生关系给予陪伴。亲子分离程度与留守生活满意度对亲子联结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

(二)青少年及成年早期:亲子分离感知与亲子联结的互构

当受访者从童年进入青少年,尤其是在尚未步入就业和婚育阶段的成年早期^①,其亲子空间距离并未缩减。初高中阶段,受访者与父母的互动关系因学习成绩、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本研究中,男性留守者在初高中阶段大部分经历了因沉迷电子游戏而导致学习成绩下滑或辍学、转学等,少数受访者是在父母短期回家加强监护或老师的严厉管教下摆脱了游戏成瘾。该过程使男性留守者与父母的关系更加紧张,他们通常选择沉默或逆反面对父母的责罚。女性留守者没有沉迷电子游戏,但是,存在因学习成绩差或早恋而停止学业的情况。受访者均面临因学习成绩起伏带来的亲子沟通压力,但是女性大多在初高中毕业后进入中职院校或高等院

^① 本研究中,成年早期特指受访者15岁初中毕业至结束学业,以及开始工作至婚育前的生命过程。由于各受访者婚育年龄差异,其成年早期时长不同。

校学习,因此,她们获得父母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亲子关系表现为有距离的积极状态。案例9和13的经历是该阶段男性和女性亲子关系的典型。

老师得知我把全部生活费用来打游戏后,让叫家长,并让我选择辍学或放弃游戏,结果我赌气辍学回家了。(案例9,男性)

我从小就懂事,学习也非常自觉,父母打电话常问我,生活费是否充足,吃得好不好,有没有衣服穿,学习怎么样等。(案例13,女性)

初高中阶段结束后,受高等教育者和不受高等教育者的亲子距离有显著差别。保持亲子分离状态中的受高等教育者,在选专业、择业等决定中均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其父母扮演倾听者而非谋划者的角色。未受高等教育者大部分流动到父母务工的城市开始工作,与父母面对面的互动显著增加。上述情况下,出现两种亲子关系类型,一是合作型,即父母参与并在其选专业、择业、换工作、学技能方面给予直接支持;二是冲突型,即不听父母的意见或建议,遵从自己的选择。

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父母基本不干预我在人生中的重要决定,比如:高中谈恋爱、复读两届,出去打工……父母只是偶尔问我是否需要经济支持。(案例7,合作型亲子互动)

我高中因早恋被退学。父母把我接到广东让我学电脑打字,希望我以后做文员。后因我又悄悄联系早恋男生,父母责备我,我选择离家出走。(案例11,冲突型亲子互动)

可见,受访者在求学阶段的亲子沟通、亲子情感与其对童年亲子分离的感知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亲子分离是通过改变亲子沟通模式这一连接亲子情感的重要渠道影响受访者的亲子分离感知的。在童年、青少年及成年早期,长期的亲子分离、寒暑假“候鸟式”流动,或替代监护关系的转换过程中,受访者与父母远程、低频的沟通模式得以强化,并逐渐固化。由此产生三种影响:第一,子女行为上的独立性和生活上的适应力增强;第二,弱化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并强化子女与父母有距离的沟通方式;第三,子女丧失了生命早期通过日常互动与父母建立亲密情感的渠道和机会。

初中之前,父母每一到两个月跟我们(案例及其弟弟)联系一次。初中后,大概每两周通一次电话……童年留守的影响可能是我跟母亲不亲近,也是我母亲经常讲的。(案例13)

另一方面,受访者对亲子分离的感知反过来强化与父母不充分的交流、不亲密的情感,并构建了一种“爱而不亲”的亲子关系基础。由于外露型受访者内心对分离的伤感、对父母的依恋表现为言语和行动,其父母则通过提高沟通频率、调整流动安排或委托监护安排或给予更多物质支持^①等方式予以回应,该类受访者与父母的沟通质量、亲近感有所改善。但是,对压抑型、部分漠然型及平和型受访者而言,他们与父母之间逐渐形成以非面对面的远程沟通或非必要不沟通为主的行为习惯,并伴随其从学前、求学、就业进入婚育阶段,并扩展至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换言之,受访者始终面临亲子沟通不充分所带来的亲子情感距离。即使父母有意识地增加电话、书信频率,或在假期团聚时增加亲子活动,而始于童年的缺少共同生活基础的亲子情感距离并未改观。

小时候每次跟父母都是发很长的信息,很少有充分的互动,确实存在沟通不畅问题……现在,我习惯文字互动,很难当面表达。(案例8)

部分外露型、漠然型、平和型受访者与其替代监护者、手足、朋辈或老师建立了持续的信任感和亲密感,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在留守期间有稳定的监护环境、温暖的监护关系;二是在生活和学习上获得了较持续、可信赖的支持。

^① 绝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示,在留守期间,父母在物质和经济上给予比同龄人更多的支持。

(三)成年期的就业与婚育阶段:亲子联结的强化与固化

本研究中的成年期,指个体开始工作并进入婚育状态的生命阶段。一方面,受访者角色由孩子转变为与父母一样的进城工作者。这种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使受访者更能亲身体会父母外出务工的艰辛和选择将其留守的无奈,同时,部分低学历受访者因与父母在同一城市工作,有更多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亲子交流。另一方面,在成年期的亲子互动中,亲子之间的支持者、关怀者和照顾者角色发生了转换,子女成为可以给父母提供支持、关爱和照顾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反哺”父母的方式与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非常相似,即注重远程的物质输出、缺乏情感交流。具体表现为,虽然移动设备、交通发展方便了远程沟通和流动,但是他们与父母仍保持一年见一到两次的频率(在同一城市工作的除外),很少与父母长聊、深聊,且大多只在必要时进行电话沟通。子女从自身角度出发,尽其所能在经济上支持父母,比如,为父母置办自己认为必要的贵重物品、支持父母旅行、帮父母购买商业保险等,成为其表达对父母的关爱的下意识行为。

婚育阶段,农村“80后”青年是否与父母同住取决于是否需要父母帮助照护其子女,而非弥补童年时期亲子陪伴缺失的主观需要。在已婚已育人员中,除去因父母生病、年事已高、选择自主带娃或父母拒绝帮助的情况,其余受访者均因需父母帮助照护其子女而选择与父母共同生活数月、数年或持续共同生活。成年时期的大部分受访者的亲子空间距离缩短,有助于拉近亲子情感距离。但是,除童年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受访者外,其余受访者都表示跟父母有较少心理或情感交流。受访者的自评亲子亲密度得分(总分为10分)区间为3至10分,均值为7.44分,得分较低的原因是童年留守产生的情感距离,以及很难改变远程、低频的亲子沟通习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父母或伴侣曾指出其与父母之间有距离感、缺乏亲近感。但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而言,成年期与父母共同生活的经历增进了亲子理解和情感。

五、研究发现与展望

本研究借鉴生命历程理论,基于自传和回溯性访谈分析了18名有留守经历的农村“80后”青年在童年、青少年、成年早期和成年期与父母的沟通及情感状况。本文显示,第一,从情绪强弱和行为表现角度,受访者对童年时期亲子分离的感知可分为外露型、压抑型、平和型与漠然型四种。第二,受访者较强的亲子分离感知,通常来自较高的亲子分离程度、较低的留守生活满意度,且后两者独立作用于前者。第三,童年的亲子分离感知,使受访者在青少年时期与父母形成“有距离”的沟通模式、“爱而不亲”的情感模式,并在成年早期进一步固化为缺乏沟通和亲近感的亲子关系。第四,在成年期的婚育阶段,受访者与父母共同生活增进了对留守经历的积极感知和对父母的理解,但是并未实质改善亲子沟通,提升亲子情感联结。整体而言,从童年、青少年到成年早期、成年期,受访者与父母的亲子关系经历了从较强距离感、习惯距离感到距离感固化和逐渐弱化的转变过程。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首先,在留守群体中,童年的亲子分离通过个体的分离感知、亲子联结对亲子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且该亲子依恋内部工作模式既具可塑性,又相对稳定。正如现有研究所述^[72-73],随着个体成长而转变的发展性因素和特征性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亲子距离感,进一步表明亲子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具有可塑性。与此同时,留守经历产生的亲子情感缺失无法经由替代监护者或其他重要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进行弥补,也即亲子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中情感联结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同时印证了依恋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有关生命早期亲子依恋对其亲子关系的作用具有嵌入性和历时性的观点。

其次,纵观有留守经历的农村“80后”青年生命历程,生命早期的亲子分离经历对其亲子关系的影响效应与个体对亲子分离事件的心理感知和行为反应直接相关。在既有研究中,留守经历造成的亲子分离被认为是负面事件,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缺场、亲子分离并不必然带来父母养育缺位、亲子关系断裂^[74],发生的亲子疏离也不一定具有成年期固化的稳定特征^[75]。而两种影响的差异,源于个体对亲子分离事件的不同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亲子沟通模式。在不同生命阶段,个体亲子关系的演化会随着对亲子分离事件的认知和亲子沟通情况的变化而转变。留守经历者在就业或婚育阶段,因其对为人父母的不易感同身受,增强了其对童年留守的积极认同,并且成年后与父母共同居住改善了亲子沟通,这成为亲子情感距离弱化的重要原因。

虽然留守经历的心理影响取决于个体体验,且因人而异,但亲子情感上的距离感贯穿农村“80后”青年的整个生命历程,汇聚成群体性社会心理现象,并演化为独特的驱动力,影响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选择。比如,在育儿过程中,受访者始终带着强烈的感知,要多陪伴子女,最好不与子女分离,并注重加强与子女的情感沟通。他们的育儿行为和观念显著不同于父辈,这与他们对自身成长的积极反思有关。

最后,留守者生命历程的获得感并不能替代亲子亲密的缺失感。具体而言,农村“80后”青年成长于我国经济、教育、生育等的变化与发展中,该群体的生命轨迹整体上呈现持续向好的趋势,但是,这并未弥合其因童年留守而产生的与父母的情感距离。相比于父辈,本研究的大部分受访者基本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代际向上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受访者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认为父母外出务工的安排终有所得。但是,无论是受访者本人,还是与其同样有留守经历的手足,均对因童年的亲子分离而缺少与父母建立亲密联系感到遗憾。

为更好地增进留守家庭亲子亲密程度,可以从以下角度着手,一是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增加亲子日常沟通频率、提升亲子情感交流的渠道和机会,减少亲子分离感知的消极情绪,同时鼓励留守儿童主动抒发因亲子分离而产生的情感;二是提升替代监护稳定性、细致度,从手足、朋辈、师长等主体入手为留守儿童在家庭内外构建积极正向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提升留守生活满意度,从而更好地形成对亲子分离的积极感知,增进亲子理解。

[参 考 文 献]

- [1]《民政部:“十三五”末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643.6 万名 较“十三五”初降近三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475350847861836&wfr=spider&for=pc>
- [2] 刘 凌 吴 蕾:《“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影响的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3 期。
- [3] 陈 刚:《劳动力迁移、亲子分离与青少年犯罪》,载《青年研究》,2016 年第 2 期。
- [4][58] 雷吉红 罗 洋:《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典型连片特困地区为例》,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
- [5] 唐有财 符 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载《人口学刊》,2011 年第 5 期。
- [6][29] 张秋凌 邹 泓:《成人依恋研究在促进早期亲子关系中的应用》,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 年第 5 期。
- [7] 李 强 邓建伟 晓 箴:《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载《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6 期。
- [8][70] 郑作彧 胡 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载《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
- [9] 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 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1 页。
- [10]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载《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4 期。
- [11] Bucx, F., Wel F. V.. Parental Bond and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Adolescence, 2008, (2).
- [12] Fang, S., Galambos N.L., Johnson M. D.. Parent - child Contact, Closeness, and Conflict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21, (4).

[13][26] Aquilino, W.S.. From Adolescent to Young Adult: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arent – child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1997, (3).

[14] Belsky, J., Jaffee, S.R., Caspi, A., et al.. Inter –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Young Adulthood and Their Life Course, Ment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3, (4).

[15] Gillespie, B.J.. Adolescent Inter –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Dynamics and Leav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Parental Hom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9, (4).

[16] Wendi, L., Johnson, et al.. Parent – child Relations and Offending during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2011, (7).

[17] Turley, R., Desmond M., Bruch S.K.. Unanticipated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a Positive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2010, (5).

[18][19] Conway, C.A., Roy K., Choque G., et al.. Family Separation and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s among Latinx Immigrant Youth. Journal of Latinx Psychology, 2020, (4).

[20] Huang, Y., Qian S., Ran T., et al.. Migration, Family Arrangement, and Children's Health in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2016, (2).

[21][56] Blake, A.J., McNeish, D., Chassin, L.. Heterogeneity in Effects of Parent – child Separation on Young – adult Substance Use Disorde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22, (2).

[22] Chen, X.X., Zeng C.C.,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arly Life Parent – child Separation and Shortened Telomere Length and Psychopathological Outcomes during Adolescence.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9, (1).

[23] Liu, J., Liu, S., Mayes, L., et al.. The Impact of Life Skills Training on Behavior Problems in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Pilot Study.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6, (1).

[24] Nan, Z., Laia, Et Al.. Does the Timing of Parental Migration Matter for Child Growth? A Life Course Study on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015, (5).

[25] Fu Y., Law Y.W.. Chinese Adolescents' Meaning – focused Coping with Prolonged Parent – child Separ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017, (35).

[27] Joan B., Laura M.F., Patricia H.. Inside Out and Outside in: Psycho – dynamic Clinical Theory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Contexts. Jason Aron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1, pp.1–18.

[28] Cassidy J.E., Shaver P.R.E..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99, (1).

[30] 马伟娜 曹亮 桑标:《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依恋稳定性》,载《心理科学》,2009年第4期。

[31] Joseph, P.A., Kathleen, B.M., Gabriel, P.K., Kathleen, M.J..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ttachment Security Across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2004, (6).

[32] Waters, E., Hamilton, C.E., Weinfield, N.S.. The Stability of Attachment Security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General Introduction. Child Development, 2000, (3).

[33] Feeney, B.C., Cassidy, J.. Reconstructive Memory Related to Adolescent – parent Conflict Interactions: the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 related Representations on Immediate Perceptions and Changes in Perceptions Over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3, (5).

[34] Pietromonaco, P.R., Barrett, L.F.. The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Concept: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the Self in Relation to Other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0, (2).

[35] 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研究概述及探讨》,载《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5期。

[36] 张伶:《依恋理论对婴幼儿依恋关系建立的启示》,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5期。

[37] Jungbauer, J., Kaufmann, K., Metz, D. et al.. Attachment Styles in Adult Children of Mentally Ill Parents. Psychiatrische Praxis, 2019, (7).

[38] Bojczyk, K.E., Lehan, T.J., McWey, L.M. et al.. Mothers' and Their Adult Daught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1, (4).

[39] 罗国芬:《“形同”与“质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建构中的国际比较》,载《青年探索》,2019年第3期。

[40] 金灿灿 邹泓 曾荣等:《中学生亲子依恋的特点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父母亲密的调节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年第6期。

- [41][72] 安 芹 吴玉坤 王 茹 等:《青少年自我分化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年第5期。
- [42][73] De M., J., Stas, L., Antrop, I., Buysse, A., et al.. Adolescent Attachment: a Social Relations Perspective on Family Relations. *Family Process*, 2022, (2).
- [43] 田菲菲 田录梅:《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影响问题行为的3种模型》,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6期。
- [44] Hoellger, C., Sommer, S., Albert, I., Buhl, H.M.. Intergenerational Value Similarity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21, (6).
- [45][66] 刘金华 吴 茜 秦陈荣:《亲子亲合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研究》,载《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2期。
- [46] 邓丽群:《论和谐亲子互动关系的构建》,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47] Einav, M.. Perceptions about Parents' Relationship and Parenting Quality, Attachment Styles, and Young Adults' Intimate Expectations: a Cluster Analy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4).
- [48] Scharf, M., Mayseless O.. The Capacity for Romantic Intimacy: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Best Friend and Marital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1, (3).
- [49] Rothbaum, F., Morelli, G., Pott, M., Liu - Constant, Y.. Immigrant - Chinese and Euro - American Parents' Physical Closeness with Young Children: Themes of Family Relatednes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0, (3).
- [50] 王英杰 张 刘 李 燕:《母亲养育心理灵活性与6岁幼儿问题行为: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第1期。
- [51] 刘晓洁 李 燕 谢庆斌 等:《母亲依恋焦虑与学前儿童社交焦虑的关系:婚姻冲突和亲子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年第4期。
- [52] 高 健 张 靓 葛文静 等:《家务劳动与幼儿多动行为:亲子亲密度与幼儿动作协调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载《中国特殊教育》,2021年第8期。
- [53] Johnson, M.D., Galovan, A. M., Horne, R.M.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dult Children's Relations with Parents and Intimate Partne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7, (7).
- [54][67] 凌 辉 黎任水 张建人 等:《小学高年级学生亲子关系与学校适应:自立行为的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年第1期。
- [55] 宁 宁 周 正:《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载《中国特殊教育》,2022年第2期。
- [57] 张艺涵 张 婷 赵景欣:《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亲子分离年龄和分离时长的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第1期。
- [59] 刘占兰:《农村幼儿留守生活的潜在心理危机与应对》,载《中国特殊教育》,2017年第3期。
- [60] Zhou T.J., Yuan M.Y., Ren H.Y., et al.. Childhood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nd Self - harm in Adolescence: a Cross - Sectional Study in China's Mainland. *Original Research*, 2022, (1).
- [61] Bae, D., Wickrama, K.A.S.. Stress Processes Linking Parent - child Disconnection to Disease Risk in Young Adulthood: Amplification by Genotyp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7, (5).
- [62][69][75] 杜云素:《缺席的父母能否弥补缺席的爱:留守经历大学生亲子关系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6期。
- [63] 刘志军 徐 芳:《留守经历与社交困难——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载《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
- [64] 李云森 王军辉 罗 良:《亲子分离之殇:父母外出与农村儿童的福利损失》,载《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1期。
- [65] 彭运石 胡 昆 王玉龙:《亲子分离年龄对留守儿童亲子依恋的影响:家庭功能的调节》,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年第4期。
- [68] 吴重涵 戚务念:《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71][74] 胡 薇:《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载《社会》,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 彦)